

# 城市新移民社会认同的结构模型\*

张文宏 雷开春

**摘要：**本文根据亨廷顿关于社会身份的分类模式，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的统计方法，通过群体认同、文化认同、地域认同、职业认同、地位认同等对城市新移民十分重要的五种社会认同类别，探索移民社会认同的内在关系结构。结果表明移民的社会认同呈现出一致性认同与差异性认同并存的关系结构，具体表现为：职业认同与群体认同和地位认同，地位认同与地域认同，地域认同与文化认同和群体认同，群体认同与文化认同之间存在着一致性认同的倾向；职业认同与文化认同和地域认同，地位认同与文化认同和群体认同之间存在着差异性认同的倾向。此外，本研究还发现城市新移民的定居打算与其采纳本地节日的状况和他们对子女的期望之间均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关键词：**社会认同 城市新移民 结构方程模型

## 一、前言

从历史上来看，关于“社会认同”有不同的理解。例如塔菲尔和特纳提出社会认同是“一个社会的成员共同拥有的信仰、价值和行动取向的集中体现，本质上是一种集体观念，它是团体增强内聚力的价值基础”（Tajfel & Turner, 1986）；劳伦斯和贝利提出社会认同是“这样一些关系，诸如家庭纽带、个人社交圈、同业团体成员资格、阶层忠诚、社会地位等”（张乃和，2004）；张春兴认为社会认同是“个人的行为思想与社会规范或社会期待趋一致”（张春兴，1993：27-8）；而王春光则社会认同视为“对自我特性的一致性认可、对周围社会的信任和归属、对有关权威和权力的遵从等等”（王春光，2001）。显然，这些理解都是发生在个体对自我社会身份/特性（social identity）的回答当中。根据布鲁巴克对身份所做的分析，身份并不是或可能是一种人们可以宣称他们拥有的东西，因此，身份本身不是真实的，从这层意思来看，身份不是，也不可能导致人们去行动，而是他们根据

---

\* 本文为第一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城市新移民问题研究》（05BSH054）的阶段性成果。同时，本研究受到上海大学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组织研究中心的部分资助，特此致谢。

自己的原因和目的来构建和实践身份 (Brubaker & Cooper, 2000; Brubaker, 2004: 28-63)。由于“identity”和“identification”都是名词, 都很容易被具体化, 但重要的问题是我們如何去探讨它们, 而不是人为地把它们作为相互排斥的选项 (Jenkins, 2008: 14-5)。在具体讨论时, Jenkins 采用了动名词式的和开放式的“认同”(identification) 一词来代替“身份”(identity) 进行讨论 (Jenkins, 2008: 9)。本研究沿续了这一分析逻辑, 认为任何“identity”都需要以“identification”的形式来促使人们产生行动。所以, 在本研究中, 社会认同 (social identification) 指个体对其社会身份 (social identity) 的主观确认。

毫无疑问, 对于一个社会现实中的主体来说, 他有着许多社会身份来源。社会学家亨廷顿将人们的社会身份/特性分成了 6 类: (1) 归属性的, 例如年龄、性别、祖先、血缘家族、血统民族属性和人种属性等; (2) 文化性的, 如民族、部落、从生活方式界定的民族属性、语言、国籍、宗教和文明等; (3) 疆域性的, 如所在街区、村庄、城镇、省份、国别、地理区域、州和半球等; (4) 政治性的, 如集团、派别、领导地位、利益集团、运动、事业、党派、意识形态和国家; (5) 经济性的, 如职务、职业、工作单位、雇主、产业、经济部门、工会和阶级; (6) 社会性的, 如友人、俱乐部、同事、同仁、休闲团体及社会地位等 (亨廷顿, 2005: 25)。从中可以看出, 个体的社会认同应从多维度的社会身份认同来理解, 对移民社会认同的理解也不应该例外。

根据亨廷顿的分类, 已有国内外移民社会认同研究却呈现出视野简单化的倾向。从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的《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开始, 作为既有别于原有社会的居民也不可能等同于本地居民的外来移民, 文化性身份的转换就为移民社会认同研究的主要议题, 后来的大多数移民认同研究也都沿袭了这一思路。在我们将“移民”和“社会认同”作为关键词, 并将搜索目标放在所有领域的文献资料中时, 发现最终选择出来的外文文献基本上都是关于国际移民文化性身份和归属感身份的研究, 这一结果与 Loretta (1999) 的发现不谋而合; 中文文献基本聚焦于城乡移民 (尤其是农民工) 在城市人-农民这一归属感身份及城市居留意愿方面的研究。需要指出的是, 对于移民来说, 社会身份并不能简化为文化性身份或归属感身份。正如人们批评社会融合的多元文化模型将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单地化为“文化问

题”一样，移民社会认同的内容也是复杂的，仅用文化认同或用某一种社会身份的转换来代替移民的整个社会认同转换问题都是狭隘的。Brown（2000）在评论社会认同理论及其发展时也指出，社会认同具有多样性的维度，仅考虑一种维度的认同是不够的，它应作为重要的社会心理机制而被关注，对社会认同概念的拓展是其未来的发展方向之一。本研究则希望在亨廷顿的理论架构基础上，关注移民的多维度社会身份认同现象。

一直以来，移民对新社会身份的完全认同都被作为衡量其社会适应的重要标志；新近的一些研究开始挑战这一观点，指出某些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移民可能会出现回归传统文化的倾向（Kim & Hurh, 1984: 18；刘玉照，2004）。然而这些研究大多停留在理论构建或潜在假设之上，几乎还没有研究将移民社会认同的关系问题作为直接的研究主题，至今我们仍不清楚移民社会认同的内在关系。本研究试图通过上海城市新移民的调查数据，根据亨廷顿的分类方法，通过结构方程模型的统计方法来探索移民社会认同的内在关系结构。

## 二、研究设计

###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调查数据来自张文宏主持的《城市新移民研究》课题，调查工作从2007年4月初开始，到5月底完成；调查员由社会学专业博士、硕士研究生及本科生构成，在访谈前经过了系统的专业培训；本次调查采用了受访者推动抽样（RDS）方法来抽取新移民的样本（赵延东，2007）。该方法是在传统“滚雪球抽样”方法的基础上，结合社会网络分析的理论和方法，使研究者有可能根据样本对总体特征做出合理的推论，通过受访者推动的抽样方法获得了1150份样本的联系方式、家庭或工作单位地址，其中有885名同意接受面谈或电话访问，拒访率为23.1%。在成功访问的样本中，经过对数据的逻辑检验，又剔除了拒答或漏答超过问题总数1/3的问卷，最后获得有效样本600份（张文宏、雷开春，2008）。

### （二）主要概念的界定

根据亨廷顿的分类，社会身份可以分为归属性身份、文化性身份、

疆域性身份、政治性身份、经济性身份以及社会性身份(亨廷顿, 2005: 25)。我们分别以群体认同、文化认同、地域认同、职业认同和地位认同来考察除政治性身份外的 5 种社会身份之间的关系结构。

文化认同(culture identification), 即文化身份认同, 是对“我应该采用哪一种文化模式”的回答。正如许多国际移民研究所证实的那样, 所有刚到美国的人都面临适应的挑战, 包括新的语言、习俗、法律及生活方式; 移民儿童及青少年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 我们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接受英语和主流价值观需要放弃太多以前的传统和自我感(Lewis, 2000)。无论文化差异是否明显, 文化认同的转换问题都是每个移民首先需要重新回答的社会身份问题, 这可能是当代关于移民文化认同研究最为丰富的原因。文化认同体现在穿戴的服装、吃的食物、交往的人群、坚持的价值观以及用来适应新文化与当地人的策略等方面(Ward et al., 2001)。从国内的南北文化差异, 到国际的东西文化差异, 或许文化差异程度有所不同, 但每一位移民都能感受到文化差异带来的冲突: 他们必须应对新的文化社会压力和标准, 他们必须理解新社会环境, 决定怎样和/或是否融合到当地文化中(Markus & Kitayama, 1991; Markus, Kitayama & Heiman, 1996)。当前, 在文化适应上存在着“同化论”和“多元文化论”两种模型, 前者强调外来移民对迁入地文化的吸收, 后者则强调外来移民对原住地文化的保留。我们认为两者并不是对立的, 正如罗伯特·苏罗(Robert Suro)所说, 对于大多数成长在拉丁美洲的新近移民来说, 他们会感觉自己相当适应美国的文化, 同时也感到无需放弃他们的“拉丁情结”(Suro, 1998: 71; 麦格, 2007: 358), 也就是说, 新近移民可以不必在两种文化之间做选择, 他们可以更加自由而成功地穿梭于其间。金(Kim & Hurh, 1984: 18)将这种文化适应称为“和而不同”型移民适应类型, 即“非零合型适应”。这似乎暗示文化认同作为移民社会认同标志的唯一性受到了挑战。

群体认同(group identification), 即群体身份认同, 是对“我归属于哪个群体”的回答。一个族群的边界主要是社会边界(Barth, 1969: 14, 转自巫达 2004), 文化边界并不等于族群边界。由于缺乏明确的外部边界和客观边界, 血缘关系上的集体信念是判断移民的族群认同的主要标志(Jenkins, 1997; Levine, 1997), 而“语言、宗教信仰、种族、文化特质、历史的共享感以及与族群紧密联系的符号都会增强和加固这种主观的归属感”(De Vos, 1995), 大多数国际移

民研究强调的是“族”性，而对“群”性的研究相对较少，也很难将族群认同与文化认同区分开来。有时候，族群认同也是一种社会制度安排的结果。例如，巴勃罗·比拉的研究表明，美籍墨西哥人为融入美国社会，比照了美国的盎格鲁人以及边境对面的墨西哥人后确定了自己是谁，而当局巡逻阻止墨西哥非法移民的行为客观上在做美籍墨西哥人自己主观上已做了的事：跟墨西哥同胞划清界限，另建构一个居美墨西哥人的社会认同，因而国家权力本身就参与了族群认同的建构过程（比拉，2000）。因此，文化认同并不是族群认同的前提，文化认同与群体认同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移民的社会认同。由于各族群可以轻而易举地迁移但又能在全球范围内保持联系，作为移民整合的结果，许多人现在都有多种群体从属关系以及更复杂的族群认同（Castles & Miller, 1993），“群体身份的面貌已不再是熟悉的人类学上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各种群体不再以地域组成的方式紧密联结，在空间上不再受限，在历史上不再连续，在文化上也不再同质”（Appadurai, 1991: 191-192），换句话说，移民可以不认同迁入地文化，却在群体上认同为本地身份，外地-本地群体认同是反映移民社会认同的重要内容（唐斌，2002；唐利平，2005）。

地域认同（region identification），即地域身份认同，是为“我将归属在哪里”的问题提供答案（Paasi, 2003），指群体与固定地区之间关系的自我认同（Paasi, 2001）。在某种程度上，地域认同是对地域成为制度化过程的一种解释，是一个各种领域边界、象征和制度形成的过程，同时这一过程引起并受到谈论/习惯/仪式的限制，从而形成边界、象征和制度习惯（Paasi, 2001）。在地理学中，地域认同经常被表述为对某个地方的感觉和归属（Millard & Christensen, 2004），因此地域认同对人们有重要意义。Relph 认为，当前对地域（地方）认同的观点可解释为社会建构和过程（Paasi, 2002）。地域认同叙述不可避免地表达了“力量布局（power geometries）”（Massey, 1993），社会行动者都处于不同的位置，那些具有制度性地域身份的本地居民，就是力量布局中的优势群体。例如对我国劳动力移民在城市-乡村归属问题上表现出的矛盾性和模糊性的诸多探讨（文军，2001；唐斌，2002；覃明兴，2005），以及关于农民工的定居意愿、城市归属感、未来认同和社区认同等具体问题的分析（胡兆量，1997；王汉生等，1997；李强，2003；米庆成，2004；王毅杰，2005），均以“城市是优越的，农民对城市有较高的认同”为理所当然的研究前

提，这直接体现了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优越性。近年来，有人开始关注区域性制度分割问题，认为地方财政分权体制下的城市社会保障是偏向本地市民的，对外来人口，无论是农民工还是“外来市民”，在保障获取上都处于不利地位（张展新，2007）。这一研究提示我们，外来移民可能并不是盲目认同城市，而是指向某一特定城市/地域的。因此，地域认同应反映移民对特定城市/地域的认同状况。

地位认同 (SES identification)，即社会经济地位身份认同，是对“我的社会经济地位归属于哪一个阶层”的回答。尽管许多学者都着眼于客观分层的研究和讨论，但社会分层研究的创始者们，如马克思和韦伯等从一开始就指出社会分层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客观，它与人们的主观意识有着密切的联系。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当工人阶级对自己的阶级地位和阶级利益有了充分的觉悟后，才会从“自在阶级”转化为“自为阶级”，这是一种主观的“阶级意识” (class consciousness)，这种阶级意识概念的基础是强调不同社会群体间直接、尖锐的利益冲突的阶级分析理论（马克思，1972/1852：159；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人民内部矛盾研究”课题组，2004）。而受韦伯多维分层思想影响的学者们则更愿意将这种主观意识称为一种“阶层意识” (status consciousness)，即一种居于一定社会阶层地位的个人对社会不平等状况及其自身所处社会经济地位的主观意识、评价和感受，阶层意识的基础不仅是物质经济利益的差别，还可以建立在经济、权力、文化等各种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基础之上（Jackman et al., 1973：569；刘欣，2001）。作为阶层意识的一个组成部分，主观阶层认同 (status identification) 反映的是“个人对其自身在阶层结构所处位置的感知” (Jackman et al., 1973：569)，它构成了阶层意识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人民内部矛盾研究”课题组，2004）。因此，主观阶层认同（本文简称地位认同）是移民选择离开或留下的内在标准。从新古典经济理论、新移民经济理论、双重劳动力市场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对移民动因的理解，到移民网络理论、制度理论、连锁动因理论和移民系统理论对持续出现的移民现象的理解（Massey et al., 1993），我们可以看到移民现象反映的是人们对改善社会经济地位所做的努力。国际移民地位研究大多站在族群分层的视角来考察移民的客观社会地位，认为大多数移民处在底层的从属地位，少部分移民处于低于等级制度上层支配群体的中间地位（麦格，2007：36-44）；我国城乡移民的社

会地位也受到了强烈关注，尽管有人曾提出“底层精英”的概念（李强，2002），但较为一致的观点还是认为他们在城市中处于社会底层。移民的这种客观地位现状似乎与移民迁移的最初动机相违背：移民的社会地位并非都得到了提高。作为移民社会认同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认同则能更直接地反映移民迁移的现象。

职业认同 (career identification)，即职业身份认同，是对“所从事职业的认同程度”的回答。已有研究表明，无论新移民还是老移民，移民的职业转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群体的职业倾向，移民倾向于从事自己相对熟悉的职业。例如第一次美国移民浪潮中的爱尔兰人大部分都是不识字的农民，他们主要集中于铁路建设和运河开凿，在大的码头当搬运工，在城市扩建的各种建设项目里工作，而女性则主要从事家政服务；大部分德国人则是零售商、生产工人、小店主或专业人员，只有一小部分是没技能的劳工；大部分波兰人、意大利人以及东欧犹太人则在第二次美国移民浪潮中成为了最底层劳工（麦格，2007：129-135）。尽管职业种类未曾有很大的变化，但工作机遇不同却是大部分移民对迁移美国原因的一致回答（Saad，1995）。移民对自己所从事职业的认同也因迁移而发生变化，这种职业认同的转换能更深入地反映职业决定长期迁移的动因。在国内城乡移民（尤其是农民工）身上，我们能清楚地看到与国际移民相似的职业倾向。实际上，无论移民们迁移后从事的职业是什么，真正决定他们决定继续生活下去的原因来自职业认同。所以，职业认同也是反映移民社会认同的重要标志。

### （三）变量测量

为了更准确地反映城市新移民社会认同的真实情况，本研究采取了直接测量与间接测量两种方式对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认同进行具体测量。

文化认同：指城市新移民的本地文化身份认同。已有相当多的文献（如 Rogler, Cortes & Malgady, 1991; Cuellar, Arnold & Maldonado, 1995）表明行为上的变化与文化适应相关；然而，文化适应的认知指标验证起来比较困难（Bhugra, et al., 1999）。原因在于，当我们考察群体间交往引起的变化时，认知和行为改变并不总是同时发生的。因此，文化认同很难直接测量，已有研究中未见对文化认同的具体测量指标。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对本地文化的认同会影响其社会认

知，从而指导移民们的行为，如他们穿戴的服装、吃的食物、交往的人群、坚持的价值观等，因此某些行为更可能伴随文化认同的产生而发生。本研究设计了4项间接测量本地文化认同的指标：<sup>①</sup>①学习语言，指主动学习本地语言的状况，操作化为“您能讲上海话吗？”，分为“能讲”、“能讲一些”和“不能讲”三种程度，分别赋值3、2、1；②熟悉风俗，操作化为“您是否熟悉本地特有的风俗习惯”，分为“很熟悉”、“大部分熟悉”、“熟悉一些”和“几乎不熟悉”四种程度，分别赋值为4、3、2、1；③接受价值，即“在日常生活中，您会按本地风俗习惯办事的程度”，分为“完全遵守”、“仅仅与本地人交往时才遵守”、“不知道”和“从不遵守”四种程度，分别赋值为4、3、2、1；④采纳节日，操作化为“您和家人会过本地人的节日吗”，分为“全部过”、“偶然过”和“几乎不过”三种程度，分别赋值为3、2、1。

地域认同：指城市新移民的未来地域身份认同。地域认同的概念来自于国际移民研究，尽管国内移民研究基本上没有在此概念的框架下进行过研究，但却直接对地域认同的具体方面进行过探讨。地域认同也是一项很难直接测量的变量，本研究采用了3项间接测量指标：①子女期望，操作化为“您希望子女在上海发展吗”，分为“非常想”、“比较想”、“无所谓”、“不太想”和“最好不留在上海”5种程度，分别赋值为5、4、3、2、1；②定居打算，具体操作化为“您未来在上海生活工作的打算是什么”，分为“长期在上海工作、生活”、“暂时不考虑”和“3-5年以后再到其他地方”三种打算，分别赋值为3、2和1；③置房意愿，分为“已购房产”、“3-5年内会考虑买房”、“没有考虑过买房问题”和“不打算在本地买房”四种意愿，分别赋值为4、3、2、1。

群体认同：指城市新移民的本地人-外地人身份的认同。族群身份认同的研究中，由于研究者的侧重点不同，而族群身份认同的构成要素就不尽相同。Fishbein（1965）认为据称族群（身份）认同由三个综合要素组成：认知要素、情感要素和行为要素。认知和情感要素可以被看作是认同的心理学成分，而行为要素则反应了认同的社会学成分（London & Chazan, 1990）。对认同的经验研究主要集中于行为层面，如参与社区活动、对与族群社区有关的组织和慈善团体的贡献以及对宗教传统的遵守（如 Chrisman, 1981; Petrissans, 1991;

<sup>①</sup> 最初的测量指标还包括“邀请本地人做客”和“家里常用语言”，因不符合因子分析的要求而被删除。



Wilder, 1996; Wertheimer, 1997)。许多该领域内的学者得到了这样的结论（如 London & Chazan, 1990; Horowitz, 1998），虽然行为要素的确是认同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它并不是认同的全部，如果没有对相应的态度和看法进行研究，仅仅是行为层面的数据并不能刻画认同的全貌。Rotheram & phinney (1987) 提出，族群认同应包括四个要素，族群知觉 (ethnic awareness) 是指个体对自己的族群和其他族群的了解，包括与族群有关的知识、主要属性、特征、历史、习俗和与其他族群间的差异等。以这些认知为基础，个体才能正确地辨识和标记出自己所属的族群。自我的族群身份认同 (ethnic self-identification) 是指个体以自己属于某一族群的知觉和概念为基础，习得正确而一致的族群标记；族群态度 (ethnic attitudes) 是指个体回应本族群和他族群意识的方式，它可能是正向积极的，也可能是负向消极的；族群行为 (ethnic behaviors) 是指个体在对本族群认知的前提下，其行为是否与本族群的要求相符（转自祁进玉，2006）。显然，对于城市新移民来说，“本地人”和“外地人”的群体差异最为显著。在学术意义上，所谓的“本地人”，主要是指社区的第一代移民及其后代，他们主要是解放前来自浙江和江苏的迁移人员，1958年户籍制度建立后，这些迁移者获得了上海户口和作为上海人的身份。作为社区的第一代定居者，几十年来，他们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文化认同和群体认同；而如今的“外地人”更多的是指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乡城迁移人口。相对“本地人”来说，他们无疑是外来者，不同的生活习惯、日常行为、语言和来源地往往使他们在共同居住中产生矛盾和分歧（赵晔琴，2007）。本研究采用的是移民的主观群体概念及其区分。具体操作化为“你认为自己属于：1) 上海人；2) 新上海人；3) 既是上海人又是外地人；4) 外地人；5) 不清楚五种选项。其中，前四项分别赋值 4、3、2、1，第五项赋值 2。

**地位认同：**指城市新移民的综合社会地位认同。关于地位认同的测量已有相当规范的测量方式，具体操作化为“您个人的综合经济地位在上海大体属于哪个层次”：1) 上层；2) 中上层；3) 中层；4) 中下层；5) 下层；9) 说不清。其中，前五项分别赋值为 5、4、3、2、1，选择第六项者不进入分析。

**职业认同：**指城市新移民对当前所从事职业的认同程度，连续变量，间接测量。研究从“薪水”、“福利待遇”、“单位/公司内的升迁机会”、“工作自主性”、“对以后发展的帮助”、“工作量”、“公司劳动

条件与设施”、“与同事的关系”、“与老板/上司”的关系、“与下属的关系”、“职业的社会声望”以及“工作地点与住址的距离”等 12 项指标来测量其职业认同。每项指标均分为“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不很满意”和“很不满意”5 种程度，分别赋值为 5、4、3、2、1。由于有的指标可能不符合城市新移民的实际情况，如他们可能没有下属，也就不存在“与下属的关系”这一指标，因此分别附加了“不好说/不适用”选项，以期更准确地反映城市新移民的职业认同情况。具体计算过程为：首先将适合的指标得分相加，得到满意总分；然后计算适用项目数，最后将满意总分除以适用项目数得到平均职业认同分。最后，为了方便理解，我们也将分布于 1-5 之间的平均职业认同值转化为一个 0-100 之间的标准分值。分值越高，表示城市新移民职业认同程度越高。

#### （四）研究框架

时间或地点的客观变化，会使人们面临多重认同选择冲突即认同问题（Brewer, 1999；赵志裕、温静、谭俭邦，2005），移民也不例外。当人们从一个国家迁移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地区迁移到另一个地区，伴随着物理空间的迁移，他们面临着居住空间、职业机会、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地位等能被直接觉察的具体社会现实的变化，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也会自然地实现社会认同的转换，迅速地形成新的社会认同。实际上许多移民在迁入许多年后仍然将自己的社会认同指向原住地社会，这种社会归属的现实错位问题会促使移民不断思考自我的社会归属问题。换句话说，移民并未面临社会认同缺乏的问题，而是面临社会认同的转换选择问题。移民对自我社会身份的追问，其目的在于获得对身份“满意的、完整一致的意义解释，以便接受和平衡转变所带来的心理风险，使自我和变化着的环境的有效联系得以重建，以免于主体存在感的失落”（钱超英，2000）。

显然，个人“过去”的经验与印象会集结成一种文化心理倾向，也就是说，当我们在回忆或重述一个故事时，事实上，我们是在自身之文化“心理构图”上重新建构这个故事（王明珂，2001）。而移民对原住地的社会认同也会以社会记忆的形式保留下来，并且以文化模式集中体现出来，文化认同更多体现的是移民对原住地的情感依恋。职业是移民最可能根据现实需要进行理性选择的部分，依附于职业上的情感依恋相对较少，因此职业是人们理性考虑下最容易发生变化的

部分。区域间分割模式（张展新，2007）表明，地区发展的不平衡，经济发达地区总能为人们提供更加良好的竞争环境和职业发展空间，因此许多移民都希望通过地域变化带来职业成功，从而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本地人-外地人身份，则兼具了文化记忆和地缘性的两重特点。本研究从与现实情境联系更紧密、更易受现实改变的职业认同为以起点，指向与原生情感联系更紧密、更易保留原生记忆的文化认同。

由于社会认同服务于自我统一性的要求，移民的社会认同之间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在理想的状况下，当城市新移民完全融入迁移地社会后，他们的文化身份、群体身份、地域身份、地位身份和职业身份之间会达到完全一致性认同状态。社会中的行动者会通过终身的认同努力（identity work），以求缔造其动态而同一的完整生命。根据结构方程模型的统计原理，一般认为因子间的相关，在有合理解释的情况下，容许自由估计（侯杰泰、温忠麟、成子娟，2004：119）。因此，我们对城市新移民社会认同的结构进行了全模型关系假设（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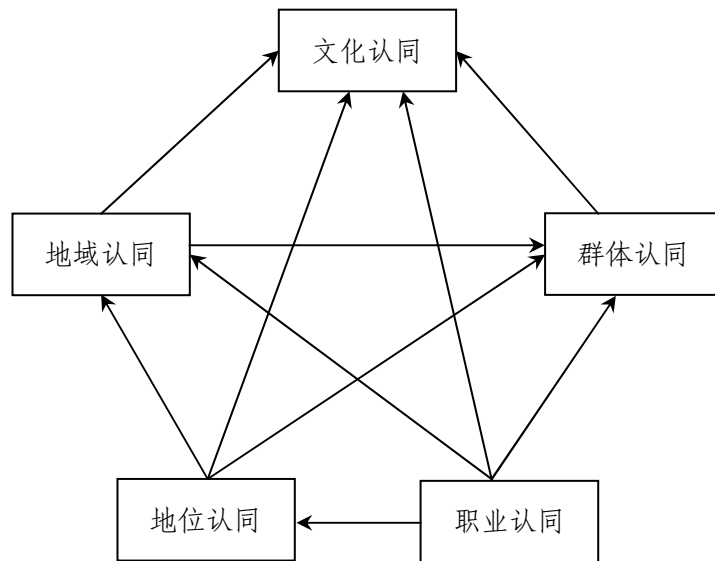


图1 城市新移民社会认同的关系假设

### 三、结果与分析

由于文化认同和地域认同是内生变量，为了减少估计偏差，我们采用 AMOS 7.0 结构方程模型统计软件对城市新移民社会认同的关系模型进行了分析和验证。其基本过程是：根据基本模型与样本数据的拟合程度对模型进行修正，然后对修正模型进行验证，最后得到一个相对最佳的模型，这就是结构方程模型中的 MG（产生模型）分析方法（侯杰泰、温忠麟、成子娟，2004：112）。

由于模型修正后，必须评价修正后的模型解是否恰当，这就需要两个样本数据。因此我们将原来的大样本数据进行随机拆分，用一半的数据建立模型和修正模型，再用另一半对模型进行交互确认，这样可避免最后所得到的模型过于依赖样本数据。经过随机拆分有效数据，得到两个样本 1（n=248）和样本 2（n=255）。<sup>①</sup>将样本 1 用于拟合和修正，样本 2 进行模型验证。在模型拟合中，我们采用的是最大似然法（ML, maximum likelihood）进行参数估计。

#### （一）模型建构

我们需要首先确定观测变量与潜变量（因子）的关系，建立测量模型。在本研究中，文化认同和地域认同两个变量为潜变量，分别对应 F1 和 F2，其测量模型见图 2 和图 3。由于观察变量所隐含的因子本身没有单位，不设定单位无法计算，可以采用固定方差或固定负荷两种方法，其中后者是最常用的方法（侯杰泰、温忠麟、成子娟，2004：29）。因子分析的结果表明，在文化认同的四项观测变量中，“熟悉风俗”的负荷值最大（ $f=.826$ ），因此将“熟悉风俗”的负荷固定为 1；而地域认同三项观测变量的负荷值差不多，但“定居打算”的负荷值相对最大（ $f=.785$ ），因此将“定居打算”的负荷固定为 1（见图 2 和图 3）。

---

<sup>①</sup> 在结构方程分析中，关于样本的容量存在不同的争议，例如 Bentler（1989）建议  $N: t>5: 1$ ，即被试要有自由参数的 5 倍以上，Nunnally（1967）认为就因子分析而言，被试人数是变量的 10 倍；而 Boomsma（1982）则建议样本容量最少大于 100，但大于 200 更好。而侯杰泰等人在综合了相关研究后认为，大多数模型需要至少 100 到 200 个被试（侯杰泰、温忠麟、成子娟，2004：12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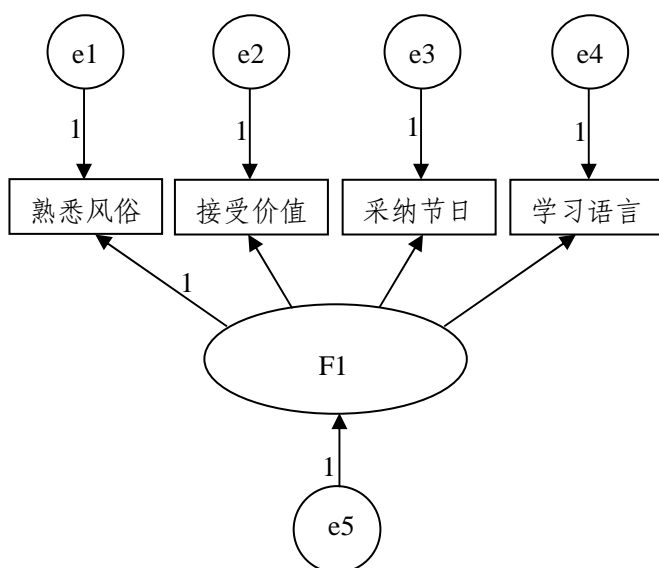


图 2 移民文化认同的测量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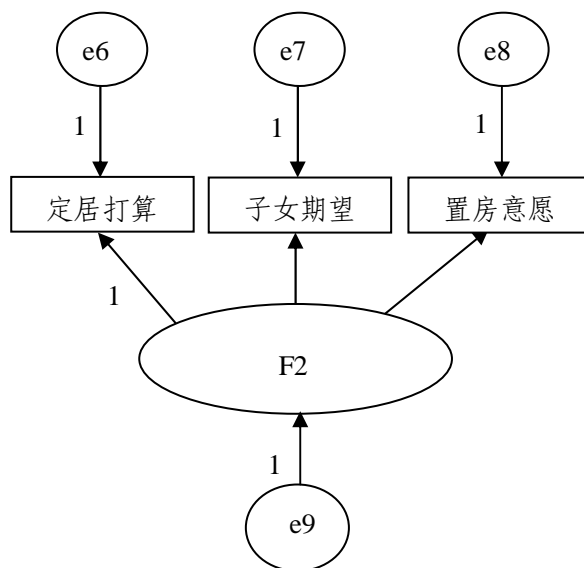


图 3 移民地域认同的测量模型

一般认为因子间的相关，在有合理解释下，可以容许自由估计，但对于指标的误差间的相关除有特殊理由外，不能随意容许自由估计（侯杰泰、温忠麟、成子娟，2004：119）。在本研究中，首先容许城市新移民社会认同之间的影响关系全部自由估计，而不容许指标的误差相关，于是得到城市新移民的结构方程模型假设，见图 4。

由于自由度<sup>①</sup>在结构方程模型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如果自由度大于 0，则是非饱和模型，为过度估计 (overidentified)；自由度等于 0，则是饱和模型，刚好能估计 (just-identified)；自由度小于 0，则是过饱和模型，不能有效估计 (underidentified)（刘军、富萍萍，2007）。从总体模型上来看，整体自由度大于 0 ( $10 \times (10+1) / 2 - 29 = 26$ )，是可识别的。其次，从局部模型来看，由于 F1 和 F2 对应的观测变量分别为 4 个和 3 个，因此结构模型不会存在“内部”借用自由度的问题（刘军、富萍萍，2007：270）。因此整个模型是可识别的。

<sup>①</sup> 所谓自由度，就是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合理地估计。自由度的计算方法是：方差—协方差矩阵中有效参数的个数减去需要估计的参数个数，就是自由度。需要估计的参数越多，自由度便越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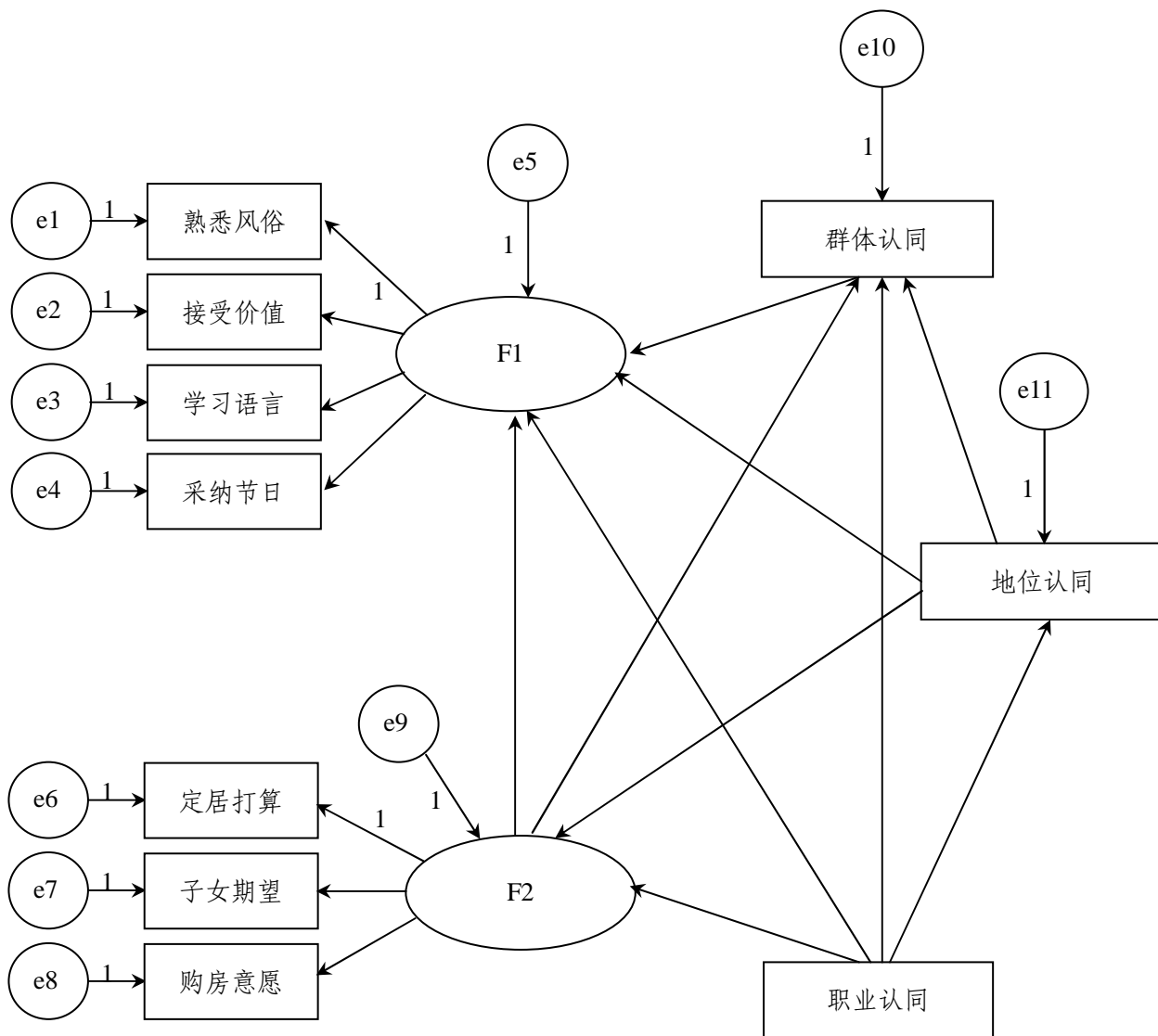


图 4 城市新移民社会认同结构方程全模型假设

的拟合指数 AGFI、塔克-刘易斯指数 (TLI) 大于 .9, 且近似均方根误差 (RMSEA) 小于 .05 时, 模型是比较令人满意的 (郭志刚, 1999: 350-4; 侯杰泰、温忠麟、成子娟, 2004: 155-161; 刘军、富萍萍, 2007:

272)。样本 1 的模型拟合结果显示，模型未通过绝对拟合检验（CMIN=55.611，df=28， $p < .05$ ），塔克-刘易斯指数（TLI=.897）和近似均方根误差（RMSEA=.063）均未达拟合测量标准，只有调整后的拟合指数（AGFI=.922）达到了拟合标准（见表 1），因此我们需要对模型进行修正。

首先，在实际应用中，如果自由参数对应的  $t$  值小于 2，则认为该自由参数不显著，应从模型中剔除，重新拟合模型（侯杰泰、温忠麟、成子娟，2004：229）。从样本 1 模拟后的参数检验的结果来看，职业认同对 F2 的影响（ $t=-1.091$ ， $p > .05$ ），地位认同对群体认同的影响（ $t=-1.395$ ， $p > .05$ ），地位认同对 F1 的影响（ $t=.746$ ， $p > .05$ ），以及职业认同对 F1 的影响（ $t=1.133$ ， $p > .05$ ），均不显著，我们将这几项影响路径进行了剔除。

然后，模型的修改需要参考结构方程分析软件输出的模型修正指数和残差矩阵。模型中某个受限制的参数，若容许自由估计，模型会因此而改良，整个模型的卡方减少的数值，称为此参数的修正指数（MI，modification index），因此，我们需要首先考虑修正的是 MI 最大或较大者。由于修改模型时，原则上每次只修改一个参数，每次修改一个固定路径，变为自由估计后，需重新计算所有固定路径的 MI（侯杰泰、温忠麟、成子娟，2004：117）。我们选择  $MI > 6.63$  作为路径可改为自由的准则<sup>①</sup>。从样本 1 重新模拟后的参数检验的结果来看，“定居打算”与“采纳节日”的残差相关的  $MI=10.719$ ，“子女期望”以及“定居打算”的残差相关的  $MI=11.358$ ，是所有 MI 中最大的，因此，我们考虑“定居打算”与“采纳节日”以及“子女期望”与“定居打算”的残差之间的相关。由于模型的拟合不能单纯只看拟合指数是否符合要求，还要考虑路径参数估计在理论上是否合理、有实质意义（侯杰泰、温忠麟、成子娟，2004：118）。从理论上来看，“定居打算”与“采纳节日”残差的相关（共享残差），表明定居打算越倾向于迁入地的城市新移民，也更愿意采纳本地节日，我们可以从社会融入的角度来理解，对于那些社会融入高的城市新移民来说，他们更愿意全身心地投入到迁入地社会，可能体现为长期定居的打算和采纳节日的倾向；“子女期望”与“定居打算”的共享残差，表明越希望子女在迁入发展的城市新移民，同时也希望自己在迁入地长期生活下

<sup>①</sup> 因为  $df=1$ ，若取  $\alpha=.05$ ， $\chi^2=3.84$  为显著，若取  $\alpha=.01$ ， $\chi^2=6.63$  为显著。

去，这可能与父母希望子女留在身边的传统文化相关，因此增加“定居打算”与“采纳节日”以及“子女期望”与“定居打算”的残差之间的相关在理论上是有意义的。

当我们增加这两项修正后，样本 1 的模型修正结果显示，模型通过绝对拟合检验（CMIN=38.586，df=30， $p>.05$ ），调整后的拟合指数（AGFI=.945），塔克-刘易斯指数（TLI=.970）和近似均方根误差（RMSEA=.034）均达拟合测量标准（见表 1），MI 均小于 6.63，且所有参数值估计达到显著水平，说明修正后的模型为能拟合数据的最简模型。

### （三）模型验证

我们采用样本 2 对样本 1 的修正模型进行验证，结果显示，模型通过绝对拟合检验（CMIN=40.996，df=30， $p>.05$ ），调整后的拟合指数（AGFI=.943），塔克-刘易斯指数（TLI=.960）和近似均方根误差（RMSEA=.038）均达拟合测量标准（见表 1），说明样本 2 能较好地验证样本 1 的修正模型，即我们可以接受样本 1 的修正模型。

**表 1 城市新移民社会认同结构方程模型的参数指标**

参数	样本 1		样本 2
	修正前	修正后	
CMIN	$P<.05$	$p>.05$	$p>.05$
AGFI	.922	.945	.943
TLI	.897	.970	.960
RMSEA	.063	.034	.038
n	248		255

根据样本 1 的修正模型，我们确定了城市新移民的结构方程模型（见图 5）。由于变量的测量单位不同，为了清楚地看到各变量之间的关系，图中标出的是各观测变量、潜变量之间的标准回归系数及统计显著水平。



从图 5 中可以看出，移民的社会认同呈现出一致性认同与差异性认同并存的关系结构，具体表现为：

职业认同与地位认同和群体认同的路径系数分别为 .297 ( $p < 0.001$ ) 和 .125 ( $p < 0.05$ )，表明职业认同越高的城市新移民，倾向于更高的地位认同，且更可能认同为本地人群体；地位认同对 F2 的路径系数为 .383 ( $p < 0.001$ )，表明地位认同越高的城市新移民，其地域认同程度越高；F2 对 F1 和群体认同的路径系数分别为 .247 ( $p < 0.01$ ) 和 .479 ( $p < 0.001$ )，表明地域认同程度越高的城市新移民，其文化认同程度越高，更倾向于本地人群体认同；群体认同对 F1 的路径系数为 .312 ( $p < 0.001$ )，说明越倾向于本地人群体认同的城市新移民，其文化认同程度越高。由于职业认同与群体认同和地位认同，地位认同与地域认同，地域认同与文化认同和群体认同，群体认同与文化认同之间的相关系数均为正数，且均达到了统计上的显著水平，表明它们之间存在显著的一致性认同的倾向。

职业认同对 F1 和 F2 的影响不显著，地位认同对群体认同和 F1 的影响也不显著，表明职业认同对文化认同和地域认同没有直接影响作用，地位认同对群体认同和文化认同也没有直接影响作用。这些结果表明，职业认同与文化认同和地域认同，地位认同与文化认同和群体认同之间存在着差异性认同的倾向。

此外，从图 5 中还可以看出，群体认同比地域认同对文化认同的影响作用更大 (.312 > .247)，地域认同比职业认同对群体认同的影响作用更大 (.479 > .125)，这表明群体认同比地域认同对文化认同的影响作用更大，地域认同比职业认同对群体认同的影响作用更大，这一结果表明那些在群体认同上更倾向于本地人身份的外来移民比那些仅仅认同迁入地城市的人，更可能认同本地文化；认同迁入地城市的人又比那些仅拥有满意职业的人，更可能认同本地人群体身份。“定居打算”与“采纳节日”和“子女期望”的残差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215 ( $p < 0.01$ ) 和 .227 ( $p < 0.001$ )，且相关程度均达到了显著水平，表明城市新移民的定居打算分别与其采纳本地节日和子女发展期望显著正相关，即越倾向于定居于迁入地的城市新移民，其采纳本地节日的程度也更高，且越愿意子女未来在迁入地城市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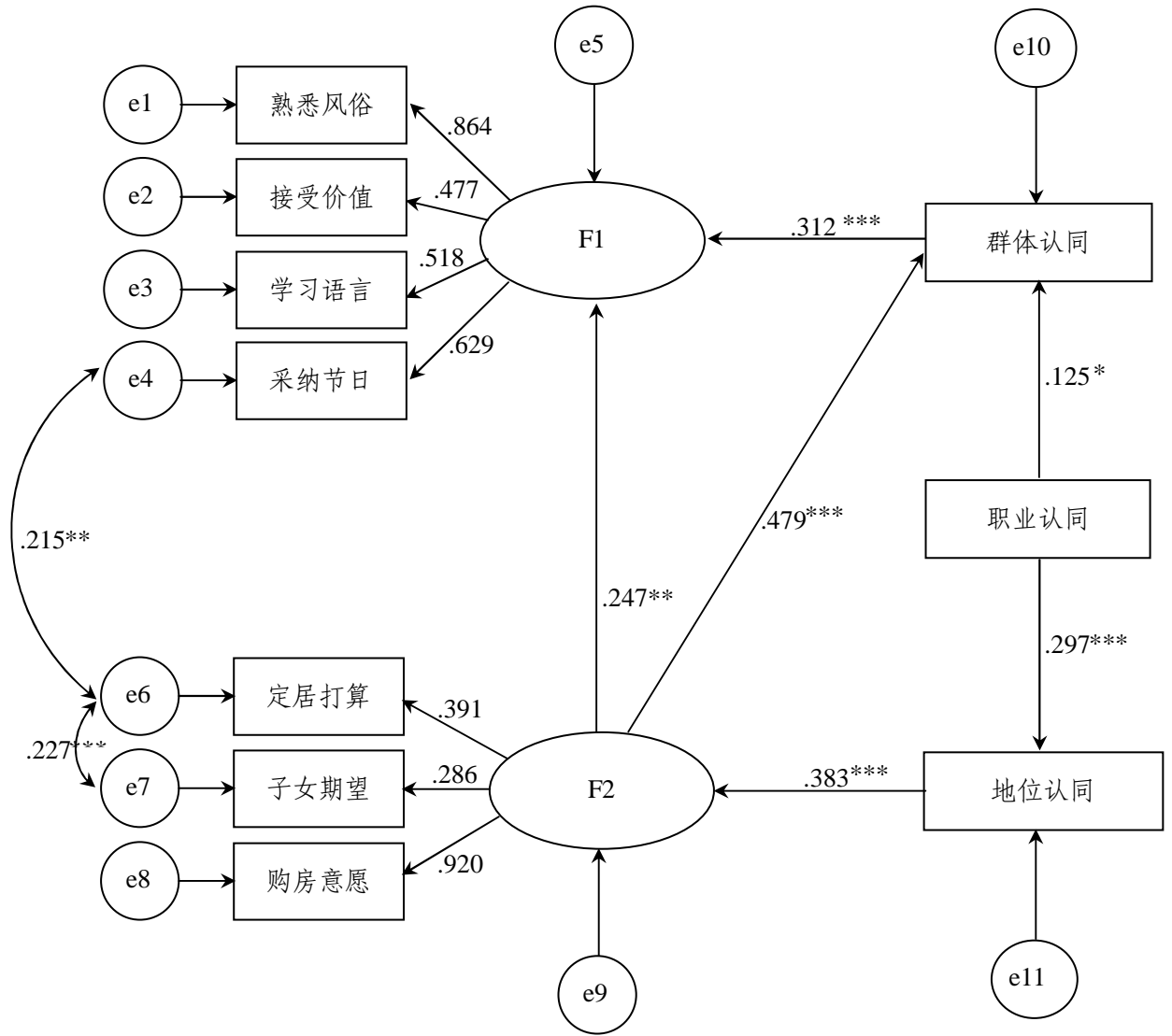


图5 城市新移民社会认同结构方程模型

#### 四、解释与讨论

在移民的原住地社会里，社会归属相对稳定和明确，社会身份的

变化小，许多社会身份不容易为人所觉察。然而，伴随物理空间的迁移，移民们都将面临社会身份/特性的重新确认问题，可能伴随着认同危机和焦虑。为了缓解这种焦虑，移民需要在原住地与迁入地社会之间不断建构和调整自己的社会身份，以确立积极的社会归属感和确定的社会自我。移民外在社会认同与内在社会认同的差异得到了许多学者的关注，由于行动者身份的多样性以及行动者与环境联系的复杂性，移民的社会认同会呈现出多样性。然而，人们的社会身份不会是完全孤立的，按照费孝通先生“多元一体”的概念：每个个体作为能动的行动者，通过终身不懈的认同努力，都在缔造自身独特的“多元一体”的完整生命。“多元”是指每个行动者身上的多元社会身份，这些多元的社会身份又以行动者的肉身（及其延伸）作为具体表征，成就其独特的完整生命（方文，2008）。已有移民社会认同研究大多关注某一社会认同（如群体认同或文化认同）的现状和影响因素，但几乎没有对社会认同内在关系的探讨。本研究通过构建城市新移民社会认同的结构模型，发现移民的社会认同呈现出一致性认同与差异性认同并存的关系结构特征，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 （一）存在着一致性认同的倾向

我们的研究发现，在职业认同与群体认同和地位认同，地位认同与地域认同，地域认同与文化认同和群体认同，群体认同与文化认同之间存在着一致性认同的倾向。

第一，我们需要理解职业身份认同为何对地位身份和群体身份认同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一方面，满意的职业为城市新移民提供了获得心理优势的内在条件。根据社会身份理论，一个积极的自我概念是正常心理功能的组成部分，为了有效地应对世界，我们需要自我感觉良好，如果没有获得满意的社会认同，个体就会离开他们的群体或想办法实现积极区分（Hornsey, 2008: 4）。对于城市新移民来说，作为外来者，他们的初始群体社会地位并不高，为了获得满意的社会认同（心理优势），职业成功是他们最可能采用的方式。在本研究中，无论是社会地位身份认同还是外地人-本地人群体身份认同，都体现出了移民寻求更高心理优势的倾向，换句话说，职业身份认同承载的是城市新移民提高自身心理优势的需要。那么，职业认同何以能承载城市新移民的地位身份和群体身份的期待呢？事实上，主观的职业满意度与客观的职业现状是分不开的，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实际生活经

验中，客观职业现状是人们获得主观职业身份认同的重要影响因素，这已成为一种关于社会地位的社会共识。从本研究对职业认同的操作化测量中可以看出，高职业认同反映的是城市新移民在总体上对现有职业的现状（包括“薪水”、“福利待遇”、“单位/公司内的升迁机会”等重要指标）有较高的满意度。这种满意感主要经由社会比较来获得。根据社会身份论，与参照群体的社会比较过程是人们获得职业满意度（职业身份认同）的重要途径。在现实生活中，城市新移民可以比较的参照群体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那些未迁移或迁移到其他地区/城市的原产地居民；第二类是迁入地社会中的本地居民；第三类是与他们自己一样的外来移民。显然，为了获得更加满意的社会认同，人们会选择更加合适的比较对象。尽管外来移民并未在客观上表现出比本地居民拥有更好的职业，但与第一类群体以及与第三类中的农民工相比，他们的确可能显示职业上的优势（李春玲，2006）。这种通过社会比较获得的相对优势是城市新移民获得高地位身份认同和本地人身份认同的主观条件。另一方面，满意的职业为城市新移民提供了获得心理优势的客观条件。从社会客观现实来看，根据上海的户籍政策，职业是获得本地制度性身份最主要的标准；移民越满意的职业也是更易获得社会认可的职业。城市新移民对职业认同越高，他们就更能拥有高社会地位认同和本地人身份认同的客观条件。

第二，城市新移民的社会地位越高，他们越可以继续停留于迁移城市，甚至希望其子女也进行同样的选择，人们会倾向于选择在地位满意的社会中生活，即使地位认同与地域认同达成一致。这一结论比较符合我们对现实生活的观察：白领移民留下来的人似乎比农民工多，经济不成功的移民更可能选择离开。任远（2008）的研究结果与本研究的结论一致：经济型流动人口特别是白领职业者的长期居留的强度高于其他类型流动人口，在2003年流动人口抽样调查中表明，因为经济成功而长期居留下来的人占到流动人口的72.1%，短期居留的人占流动人口的62.7%。我们可以从地位认同和地域认同的功能来理解这一结果。移民的地位认同越高表明其获得的社会认可越多，通过地域认同人们能很好地维持这种被认可的感受。同时，地位认同的提高，也为移民印证了迁移决策的正确性。从客观上来看，城市认同较高的大多数城市新移民，如果选择继续生活下来，在现实生活中的确可以享受到比原来更多更好的城市服务。上海，作为我国最发达的大城市之一，拥有着许多地区/城市都无法比拟的优势城市服务体系：

公平的竞争环境、高效的办事效率、快捷的交通网络、周全的生活设置、繁多的商品种类、优质的医疗卫生、丰富的娱乐活动……。这也是许多移民选择的迁移地都是比原住地更加发达的地区/城市的目的。根据现行的户籍制度，地位认同高的城市新移民获得本地户籍的可能性也越大，从而能具备更多继续生活下来的客观条件，最新的上海户籍政策试点条例已明确表明了这一推测。<sup>①</sup>从理性上来说，地位认同越高的城市新移民，会更倾向于长期居住于迁入地社会，也会更愿意子女在此地发展和生活，即他们的地域认同程度会越高。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城市新移民的地位认同越低，他们的地域认同程度也会越低，如果外来移民长期不能认同自己的社会地位，当他们又无力在这个社会中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时，从理性上来说，似乎唯一的选择便是再次迁移或回到原住地社会，这必然也会影响到他们的子女发展。因此，客观地位低的城市新移民，可能会采用向上地位的策略来缓解客观地位较低带来的焦虑感，使心理达到平衡，在地位认同而不是客观地位与地域认同达成一致。这样他们既解决了地位认同焦虑/危机，也能继续享受城市生活。因此，如何强调主观地位认同对移民的重要性也不过分。

第三，地域认同程度越高的城市新移民，其文化认同程度越高，且更倾向于认同本地人群体。首先，我们可以从社会认同一致性对自我的重要性来理解。按照社会认同理论，追求社会认同的一致性是人类内在的基本需求。同样，根据社会表征理论，生活在某地区的人是相同的一类人，会表现出相同或相似的文化模式。当某地区的人将自己归属于一类群体，并且其文化模式与其所在城市/地区的文化模式也呈现一致性，这不仅是个体内在的心理需求，也是社会的共同期待（一种习以为常的社会共识）。理想的情况是，对上海有较高认同感的外来移民，也会倾向于将自己归类为上海人（在本研究中大多数人采用的是“新上海人”），也会愿意采用上海本地的文化模式。反之，如果生活在某地区的人却不能认同客观上与之相应的文化身份和群体身份，这会给他们带来不可避免的心理冲突。当这种不一致发生在外来移民身上时，相应的心理冲突可能会更加剧烈，学者们称之为“边

---

<sup>①</sup> 详细户籍政策请参见：上海市人事局网（<http://www.21cnhr.com>）；和上海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网（[http://www.firstjob.com.cn/gic\\_web/studentbluequerymain.jsp](http://www.firstjob.com.cn/gic_web/studentbluequerymain.jsp)）；上海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shanghai.gov.cn/shanghai/node2314/node2319/node11494/node12331/node12343/node22595/userobject26ai17537.html>）

缘感”。边缘化反映的是社会成员在同一时代背景下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区域、民族、社会体系、知识体系之间从隔阂到同化过程中人格的裂变和转型特征，这是一种空间性、地域性文化冲突的产物。美国社会学家帕克曾指出边缘化社会成员的特征，“他们寄托在两个不同的群体当中，但又不完全属于任何一方，他们的自我概念是矛盾的，不协调的。其生存状态呈现出既有希望又常怀失望，既急需选择又别无选择，既要为适应新环境而进行冒险、又要为承受传统而付出忍耐，痛苦和憧憬并存，颓废与发奋同在”（胡书芝、吴新慧，2004）。这种边缘化不仅发生在国际移民身上，在国内移民身上也可能发生。例如，张海波、童星（2006）曾指出，未来归属与目前身份判断不一致的失地农民存在着自我认同紊乱。因此，为了减少这种边缘感，城市新移民可能会选择主动积极地进行社会认同转换，其中最重要的是确定文化身份和群体身份。此外，从社会现实来看，地域性文化和地域性群体都很难和地域本身分离。地域认同代表着移民们对自己的社会空间安排。地域认同越高，表明城市新移民将更加积极地将自己投入到迁入地社会当中，这种投入也包括适应地域性文化；反之，那些地域认同并不高的城市新移民，他们最终会选择离开，也就没有进行文化认同转换的现实必要性了。而从本地人-外地人群体身份认同的定义来看，群体身份与地缘性有关，地域认同越高，表明城市新移民越可能将自己的地缘性身份与本地相联系，即倾向于本地人群体认同。这一结果与美国古巴移民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即对于大部分古巴人而言，在他们最初进入美国时，并未想在这里安家定居，因此相对于大多数其他族群，他们对旧有文化的依附感更为强烈（麦格，2007：305）。因此，城市新移民呈现出的较高地域认同能间接反映出上海已形成了吸引外来人才的良好社会氛围。

第四，城市新移民越倾向于认同本地人群体，其文化认同程度越高。按照社会表征理论，文化身份认同与群体身份认同保持一致性也是社会的共同期待。从身份认同理论来看，文化身份认同与群体身份认同保持一致也能减少移民的现实和心理冲突。按照根基性认同理论，群体身份认同是人们接受群体文化的前提。一项对2000-2001年的加拿大大学生的调查表明，与那些从语言上较少被同化的人相比较，具有较高水平的语言同化的被试表现出较低水平的族群-连通性，更可能认为他们自己是加拿大人（Pigott et al., 2005），反之，当移民认同本地人身份时，他们也会表现出更高的文化认同水平，尤其

表现在语言方面。对于那些倾向于本地人群体认同的城市新移民，成为本地居民的意愿强于其他人，文化认同的转换是移民体现这种意愿的最好标志，即越倾向于本地人身份的城市新移民，会试图将自己做得像本地人，他们会越倾向于学习本地语言，过本地节日，接受本地风俗习惯，按照本地价值观待人接物。对于上海的城市新移民也一样，当他们认同自己为上海人时，就会选择与上海人一致的文化模式来行动，而文化认同也能在心理上证实移民的本地人身份。很难想象，一个人处处声称自己是上海人，却喜欢请客人到四川餐馆吃饭，并不断赞叹川蜀的风景如何秀丽。

## （二）存在着某些差异性认同的倾向

在职业认同与文化认同和地域认同，地位认同与文化认同和群体认同之间存在着差异性认同的倾向。

第一，职业认同与文化认同存在着差异性认同倾向。这一结果表明，一方面，职业认同高的城市新移民，其文化认同可能较低，我们可以从原有文化身份认同本身的特性来理解。尽管社会流动是人们维持积极社会认同的一种策略，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在社会认同的选择和建构方面是完全自由的。“认同的自由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大多数人而言往往是隐性的，并且受着特定的基础秩序的约束，在个人身上常常表现为不得不如此的样子”（吉登斯，1998）。文化身份承载着移民的根基性情感、自我说明性，文化对人们具有隐含的强制性。相对于本地文化来说，传统文化对任何一种移民都有着无可代替的重要作用，传统文化及其影响作用都并不是他们可以随意选择的。文化认同与群体认同、地域认同的分离，使职业成功对移民本地文化认同的重要性和必须性，对在像上海这样的城市中显然越来越不重要了，这里既有城市发展带来的包容性的增加，也有现代交通技术带来的便利性的增高。对于那些有较高职业认同的城市新移民来说，职业成功能够使其获得足够的心理优势，他们不必再强求自己改变文化模式。另一方面，职业认同低的城市新移民，其文化认同却可能较高。对于那些职业认同低的城市新移民来说，通过职业成功获得心理优势的可能性较小，但如果他们能在文化上与本地人保持一致（把自己做成“看起来像本地人”那样），也可以从文化优势的社会共识（认为像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文化会优于其他地区性文化）中获得心理平衡感。需要强调的是，职业身份认同的提高并未直接显著地增加城市新移民的地域

身份认同，这可能与客观的地域准入水平有关。外来移民是否能最终取得长久合法居住权以及在迁入地社会的生活状况，都与其当前户籍的状况直接相关。当外来移民发现满意的职业终究还是不能得到本地户籍时，在客观上，他们始终是一个外来者，无论主观上是否愿意，可能最终也只能选择离开。换句话说，通过地位身份和群体身份认同得到的心理地位的提高只可能是暂时性的。这与大多数农民工最终选择离开现象是一致的，农民工的职业成功感高于未迁移的家乡人，但他们获得迁入地户籍的可能性非常小，他们最后只能迫不得已返回到原住地。

第二，地位认同与群体认同和文化认同存在着差异性认同倾向。这表明，一方面，地位认同越高的城市新移民既可能更认同本地人身份和本地文化，也不可能更认同本地人身份和本地文化。客观社会地位高的城市新移民（如白领移民），和客观社会地位低的城市新移民（蓝领工人），都可能拥有较高的地位认同。相同的地位认同感，会使他们拥有相同的高自尊感，这使他们可以有心理优越感来应对文化转换和群体身份带来的压力，他们可以主观地决定是否接受本地文化和本地人身份。值得注意的是，那些高地位认同的城市新移民，其文化认同程度和本地人认同程度反而可能更低。这可能是由于地位认同越高的城市新移民，不但可以通过职业成功获得心理满足，并且也有了与本地文化抗争的客观资本。例如，他们可以利用发达通信与交通，与原有社会群体和文化保持更多联系，也可以将承载着原有文化身份和群体身份的亲戚接到迁入地来居住。另一方面，地位认同越低的城市新移民既可能更认同本地人身份和本地文化，也可能更不认同本地人身份和本地文化。对于那些客观社会地位低的城市新移民（如蓝领工人）来说，如果他们试图通过文化认同和群体认同把自己做得像本地人，却可能会受到本地人的歧视。例如，一位在苏州郊区打工的湖南农民工曾这样叙述道：“我们有些人就学当地口音，想做个真正的当地人。我现在有一个朋友，他能讲很标准的苏州话，为此也自豪过。但有时一些知道他原籍的苏州人就会讥讽他，说‘现在倒真的快成为苏州人了嘛？’每次他听到这些都会非常的痛苦。他现在已经不愿再学苏州话了，这对他是一种耻辱。”（朱力，2001）然而，这一现象也至少表明，对于那些不被人了解的农民工来说，这些改变的确可以减少受到歧视的可能性。这表明，仅仅是心理上对优势身份（本地文化和本地人群体）的认同，也能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人们的自尊感。



此外，本研究还发现，群体认同比地域认同对文化认同的影响作用更大，地域认同比职业认同对群体认同的影响作用更大。前者可能是因为群体是文化模式最具体的承载者，而地域只是规划了文化模式的空间范围；后者可能是因为人们的群体归类意识大多来自生活地而不是工作地（例如，那些生活在上海却工作在江苏昆山的人就是很好的例子）。同时，移民的定居打算与其采纳节日和子女期望之间存在着一致性相关关系。“定居打算”与“采纳本地节日”一致性可能与生活幸福度的提高有关。当移民一旦有定居上海的打算后，采纳本地节日会提高他们的生活幸福度，增加本地节日会让他们有更多理由给自己增加休闲的机会，这可能也是许多中国人选择过“洋节”的原因之一。其次，“定居打算”与“子女发展期望”的一致性可能与父母希望与子女生活在一起的传统文化有关。中国自古的孝文化中就有“父母在，不远游”的观点。对于许多移民来说，他们在经济上不再依靠子女，可能会寻求子女在精神上的慰藉，如平时的电话问候，节假日的探望，看病住院时的陪伴，生日礼物等。因此，如果不能与子女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即使居住在同一城市，也能使他们感受到更多的天伦之乐。

当然，本研究对移民社会认同结构的研究只是一次大胆的尝试，由于已有的相关研究较少，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局限。首先，地区性和非随机抽样样本，使本研究所得结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推论到其他移民群体，有待于在未来的多城市大样本中的研究中进一步检验。其次，本研究关于文化认同、地域认同和职业认同的代替性指标是否最合适，对地位认同和群体认同是否也适合采用间接测量方式还不得而知。因此，本研究结果的有效性还需要获得多时间、多地点、多样本的重复稳定结论的支持，这也是今后移民社会认同研究的方向。

#### 参考文献：

- 安东尼·吉登斯，1998，《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赵旭东、东方译，北京：三联书店。
- 巴勃罗·比拉，2000，《在跨国环境中建构社会认同：墨—美边境案例》，《国际社会科学杂志》第1期。
- 方文，2008，《转型心理学：以群体资格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 郭志刚，1999，《社会统计分析方法——SPSS 软件应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侯杰泰、温忠麟、成子娟，2004，《结构方程模型及其应用》，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 胡书芝、吴新慧，2004，《生存在边缘——对青年民工社会融入状况的社会学分析》，《青年探索》

第2期。

- 胡兆量, 1997, 《北京“浙江村”——温州模式的异地城市化》, 《城市规划汇刊》第3期。
- 李春玲, 2006, 《流动人口地位获得的非制度途径——流动劳动力与非流动劳动力之比较》, 《社会学研究》第5期。
- 李强, 2002, 《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新变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编, 《2002年: 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 2003, 《影响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推力与拉力因素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 刘军、富萍萍, 2007, 《结构方程模型应用陷阱分析》, 《数理统计与管理》第3期。
- 刘欣, 2001, 《相对剥夺地位与阶层认知》, 《社会学研究》第1期。
- 刘玉照, 2004, 《“移民化”及其反动——在上海的农民工与台商“反移民化”倾向的比较分析》, 《探索与争鸣》第7期。
- 马克思, 1972/1852, 《哲学的贫困》,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
- 麦格 (Marger Martin N.), 2007, 《族群社会学》, 祖丽亚提·司马义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 米庆成, 2004, 《进城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问题探析》, 《青年研究》第3期。
- 祁进玉, 2006, 《不同情景中的群体认同意识——基于三个土族社区的人类学对比研究》,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钱超英, 2000, 《自我、他者与身份焦虑——论澳大利亚华人文学其文化意义》,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第4期。
- 任远, 2008, 《谁在城市中逐步沉淀了下来? ——对城市流动人口个人特征及居留模式的分析》,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48卷第4期。
- 塞缪尔·亨廷顿, 2005, 《我们是谁? 美国国家特征面临的挑战》, 北京: 新华出版社。
- 覃明兴, 2005, 《移民的身份建构研究》, 《浙江社会科学》第1期。
- 唐斌, 2002, 《“双重边缘人”: 城市农民工自我认同的形成及社会影响》,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8期。
- 唐利平, 2005, 《“边际人”心态及其影响因素——三峡农村跨省外迁移民的实证研究》, 《中国人口科学》第2期。
- 王春光, 2001,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 《社会学研究》第3期。
- 王汉生、刘世定、孙立平、项飏, 1997, 《“浙江村”: 中国农民进入城市的一种独特方式》, 《社会学研究》第1期。
- 王明珂, 2001, 《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 《历史研究》第5期。
- 王毅杰, 2005, 《流动农民留城定居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江苏社会科学》第5期。
- 文军, 2001, 《从生存理性选择到社会理性选择: 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的社会学分析》, 《社会学研究》第6期。
- 巫达, 2004, 《彝族社会中的“尔普”形式的变迁》, 《民族研究》第1期。
- 张春兴, 1993, 《青年的认同与过失》。台北: 台湾东华书局、世界图书出版社。
- 张海波、董星, 2006, 《被动城市化群体城市适应性与现代性获得的自我认同——基于南京市561位失地农民的实证研究》, 《社会学研究》第2期。
- 张乃和, 2004, 《认同理论与世界区域研究》,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3期。
- 张文宏、雷开春, 2008, 《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结构、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 《社会学研究》第5期。
- 张展新, 2007, 《从城乡分割到区域分割——城市外来人口研究新视角》, 《人口研究》第6期。
- 赵晔琴, 2007, 《农民工: 日常生活中的身份建构与空间型构》, 《社会》第6期。
- 赵志裕、温静、谭俭邦, 2005, 《社会认同的基本心理历程——香港回归中国的研究范例》, 《社会学研究》第5期。

-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人民内部矛盾研究”课题组, 2004,《城市人口的阶层认同现状及影响因素》,《中国人口科学》,第5期。
- 朱力, 2001,《群体性偏见与歧视——农民工与市民的磨擦性互动》,《江海学刊》第6期。
- Appadurai A. 1991, “Global ethnoscaples: Notes and queries for a transnational anthropology.” In R.G. Fox (Ed.), *Recapturing anthropology: Working in the present*. Santa Fe: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 Bhugra et al. 1999, “Cultural identity and its measurement: a questionnaire for Asian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Psychiatry*, May-Aug.
- Brewer, M. B. 1999, “Multiple Identities and Identity Transition: Implications for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23.
- Brown R. 2000, “Social Identity Theory: past achievements, current problems and future challenge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0.
- Brubaker R. 2004, *Ethnicity without Group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rubaker R. & F. Cooper 2000, “Beyond ‘Identity’ .” *Theory and Society*, vol. 29.
- Castles S. & M. J. Miller 1993, *The age of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 Chrisman N. J. 1981, “Ethnic persistence in an urban setting.” *Ethnicity* 8.
- Cuellar I., B. Arnold & R. Maldonado 1995, “Acculturation Rating Scale for Mexican Americans II: A revision of the original ARSMA Scale.” *Hispanic Journal of Behavioral Sciences* 17.
- De Vos G. 1995, “Ethnic pluralism: Conflict and accommodation.” In L. Romanucci & G. de Vos (Eds.), *Concepts of ethnic identity: Creation, conflict and accommodation*. Walnut Creek, CA: Alta Mira Press.
- Hornsey M. J. 2008, “Social Identity Theory and 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 A Historical Review.”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2).
- Horowitz B. 1998, “Connections and journeys: Shifting identities among American Jews.” *Contemporary Jewry* 19.
- Jackman M. R. & R. W. Jackman 1973,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38.
- Jenkins R. 1997, *Rethinking ethnicity: Arguments and exploration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2008, “Social identity (Third edition), Library of Congress Cataloging in Publication Data,” Routledge.
- Kim K. C., & W. M. Hurh 1984, “Adhesive Sociocultural Adaptation of Korean Immigrants in the U.S.: An Alternative Strategy of Minority Adaptation.” *I.M.R.*, Vol.
- Levine H. B. 1997, *Constructing collective identit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New Zealand Jews, Maori, and urban Papua New Guineans*.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 Lewis C. C. 2000, “Personal and Cultural Identity.” *Human Development* 43.
- London P. & B. Chazan 1990, *Psychology and Jewish identity education*. New York: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
- Loretta B. 1999, “National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Introduction.” *Australia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Nov.
- Markus H. R. & R. J. Heiman 1996, “Culture and ‘basic’ psychological principles.” In E. T. Higgins & A. W. Kruglanski (Eds.), *Social psychology: Handbook of basic*

- principles*. New York: Guilford.
- Markus H. R. & S. Kitayama 1991, "Culture and the self: Implications for cognition, emotion, and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98.
- Massey D. 1993, "Power-geometry and a progressive sense of place." In Bird, J., Curtis, B., Putnam, T., Robertson, G. & Tickner, L., editors, *Mapping the futures*. London: Routledge.
- Massey D., et al. 1993,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 Review and Appraisal."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19, No. 19, No. 3.
- Millard J. & A. L. Christensen 2004, "BISER Domain Report No. 4 Regional Identity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by the European Community under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Technology" Programme (1998-2002).
- Paasi A, 2002, "Regional worlds and word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6.
- 2003, "Region and place: regional identity in question."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7(4).
- 2001, "Bounded Spaces in the Mobile World: Deconstructing 'Regional Identity'." *Royal Dutch Geographical Society KAN* 2.
- Petrissans C. M. 1991, "When ethnic groups do not assimilate: The case of Basque-American resistance." *Ethnic Groups* 9.
- Pigott B. S. & M. A. Kalbach 2005, "Language Effects on Ethnic Identity in Canada." *Canadian Ethnic Studies*.
- Rogler L. H., D. E. Cortes & R. G. Malgady 1991, "Acculturation and mental health status among Hispanics: Convergence and new directions for research." *American Psychologist* 46.
- Saad L. 1995, "Immigrants See U.S. as Land of Opportunity." *Gallup Poll Monthly*(July).
- Suro R. 1998, *Stranger Among Us: How Latino Immigration Is Transforming America*.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 Tajfel H. & J. C. Turner 1986, "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of intergroup behavior." In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Worchel S, Austin W(eds). Nelson Hall: Chicago.
- Ward C., S. Bochner & A. Furnham 2001, *The psychology of culture shock*(2<sup>nd</sup> ed.). Boston:Routledge Kegan Paul.
- Wertheimer J. (Ed.) 1997, *Jewish identity and religious commitment: The North American study of conservative synagogues and their members 1995-96*. New York: The Jewish Theological Seminary.
- Wilder E. I. 1996, "Socioeconomic attainment and expressions of Jewish identification, 1970 and 1990."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35.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组织研究中心（张文宏）  
上海大学心理辅导中心（雷开春）

责任编辑：张宛丽

文章来源：《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4期  
中国社会学网 [www.sociology.cass.cn](http://www.sociology.cass.cn)